

America

美国公众舆论 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1931—1941)

惠春琳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历史研究院
CHINA INSTITUTE OF HISTORY

美国公众舆论 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1931—1941)

王德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merica

美国公众舆论
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1931—1941)

惠春琳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公众舆论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1931—1941 / 惠春琳
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012-4801-8

I. ①美… II. ①惠… III. ①舆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研究—东南亚—1931—1941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5748 号

责任编辑 张 萱
文字编辑 贾丽红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美国公众舆论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1931—1941)
Meiguo Gongzhong Yulun Dui Meiguo Dongya Zhengce de Yingxiang (1931—1941)

作 者 惠春琳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20 × 1020毫米 1/16 21¼印张
字 数 2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801-8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1章 概念解析：公众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舆论观	22
第一节 公众舆论的概念	22
第二节 公众舆论的特征与分类	27
一、公众舆论的特征	27
二、公众舆论的分类	30
第三节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公众舆论观	33
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与公众舆论	33
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与公众舆论	40
第2章 摇摆与退让：公众舆论对胡佛政府远东政策的影响	47
第一节 胡佛政府远东政策的舆论背景	47
一、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漠视	48
二、美国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	50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美国公众舆论	52
一、“九一八”事变中美国媒体的态度	54
二、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美国和平主义运动	62
三、美国公众对日本侵华行为的反应	65

四、美国的中国形象：从《傅满洲》到《大地》(学者的塑造).....	68
第三节 胡佛政府远东政策的成型.....	73
一、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坚持及与国联的合作.....	74
二、不承认政策的形成.....	77
第3章 “有限介入”：公众舆论对罗斯福政府远东政策的影响.....	86
第一节 罗斯福远东政策的舆论背景.....	87
一、政党的轮替、民意的转移.....	87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	89
第二节 罗斯福执政初期的美国公众舆论.....	92
一、美国媒体对《天羽声明》的反应与政府的妥协.....	93
二、美国公众对日本蚕食华北的态度.....	100
三、利益集团对远东的看法.....	103
四、和平主义运动和孤立主义情绪.....	106
第三节 罗斯福“有限介入”远东之政策.....	111
一、《中立法》的通过：美国远东中立政策的形成.....	111
二、罗斯福“有限介入”远东之政策.....	113
第4章 转折与互动：公众舆论与罗斯福远东政策的战略调整.....	125
第一节 从卢沟桥到珍珠港：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变.....	127
一、美国媒体对中日全面战争的反应.....	128
二、国会与孤立主义情绪的高涨.....	134
三、和平主义思潮的再次分裂.....	138
四、盖洛普测验：美国对中日战争的民意.....	141
第二节 罗斯福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及二者的互动.....	149
一、炉边谈话对公众的影响.....	149
二、总统记者招待会的影响.....	151
三、第一夫人巡访的舆论引导.....	154

四、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	154
第三节 美国远东政策的转折：从中立到“全面介入”远东政策	157
一、中立、观望的远东政策：从卢沟桥的枪声到广东空袭	159
二、对日禁运政策的形成	161
三、美国对华援助政策	167
四、美国全面介入远东之政策.....	172
跋论：从政治学视角对本书的再审视	178
第一节 国会、利益集团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	181
第二节 媒体对政府远东政策的影响	184
第三节 民意测验和选举对远东政策的影响	188
第四节 全文的总结与现实意义的提炼	191
参考文献.....	200
后 记	228

绪 论

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其国内政治的影响，也有国际环境的掣肘。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Wiarda）曾将不同压力集团或群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描述为“漏斗”理论。^①该理论认为处于漏斗最上方、最宽的是美国的政治文化、普通公众和大众传媒，它们对外交政策的产生和制定发挥着最广泛的影响；处于漏斗中间的是美国的政党、利益集团和思想库，他们把公众不同的观点汇总、糅合，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从而通过影响决策等来影响外交政策的走向；处于漏斗最下方、最窄的则是美国国会、政府部门和总统，他们是真正的外交决策者。这几种因素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彼此不能相互取代。

美国政府自誉为民主政府，而“民主政府需要完成至少两项任务：其一要推行有最大成功可能的外交政策，其二要确保这些外交政策能得到民众的认可”。^②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美国三、四十年代东亚政策的制定过程，不是在白宫，而是在妇女组织和和平主义组织内部。^③自美国两党政治制度确立以来，公众舆论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

① Howard J. Wiarda, *Foreign Policy without Illusion: How Foreign Policy-making Works and Fails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Scott, 1990, pp.38-39.

② Hans U. Morganthau, *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1969, pp. 150-151.

③ 此类观点多见于日本学者。主要由于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三十年代，许多压力集团和压力组织多见于和平运动中。他们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影响非常深远。

重要因素，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考察和研究美国的公众舆论对理解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亚之于美国的重要性从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史中可见其实。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于1842年12月知会国会，要求派遣代表来华商谈建立新的经济关系。1843年5月美国政府遣使来华，要求中方给予美国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条件。1844年，美国特使到达澳门，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美五口通商章程》），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国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了与英国同等的权利，而此时，美国建国还不到100年。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日本江户湾口，以武力威胁打开了日本的大门，逼迫日本对美国开放，成为打开日本国门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爆发战争，夺取了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菲律宾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还成为了美国向亚洲扩张的战略基地。自从美国将一只脚正式踏入亚洲后，一直在寻求机会不断扩大自己在东亚的势力，先后在东亚提出“门户开放”等政策。

1905年，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斡旋调停日俄战争，并因此获得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1907年，老罗斯福以庚子赔款援助中国教育等，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对东亚的关注度一直在上升，并在积极调整美国的东亚政策。

美国对东亚的政策调整，首先是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是要理解其形成原因，公众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那么，到底是公众舆论影响了外交政策，还是外交政策决策者引导了公众舆论？美国的东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众舆论的制约？美国公众对中国和日本的情绪是如何影响决策者的？公众舆论是通过什么渠道、在什么阶段对东亚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机制到底是什么、两者之间互动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都是研究美国与东亚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本书以1931年到1941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段，选择几起

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事件^①为切入点，主要着眼于在这几起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美国公众舆论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笔者认为，研究这一时段公众舆论与美国东亚政策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理解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东亚之于美国的重要性，在历届新政府国务卿和首脑出访的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可见一斑。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东亚国家，地处东亚地理位置的核心，无论在东亚地区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东亚天然地成为了美国抑制中国的依托地区。这更加强了东亚在美国战略考虑中的地位。要想真正了解美国东亚政策的走向和定位，需对影响政策的每一个因素、每一股力量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的了解。

公众舆论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多年来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这种舆论势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产生负面的影响。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在1848年所说：“所有民主代议制政府的最基本、最重要、最持久的原则之一就是被选出的代表要遵循选举他们的人的意愿。”^②那么分析美国公众对东亚的舆论倾向、美国公众舆论的形成原因、及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进而总结出两者之间互动的规律和影响机制，将对更好地理解美国对东亚和对华政策有所助益。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力度却很薄弱，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一胶着历史时期美国与东亚关系的研究，能为此课题贡献绵薄之力。

美国学术界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公众舆论的研究，二战后达到高潮。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也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但长久以来却在公众舆论是否应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难达共识。^③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

① 这几起事件分别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罗斯福入主白宫结束了共和党多年的执政，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1939年欧洲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40年轴心国的成立，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

② John G. Nicolay and John Hay, eds., *Complete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Fite Press, Vol. 2, p. 71.

③ 详见国外研究现状。

Morganthau) 认为外交政策不应该受公众舆论的左右, “受(民众)欢迎的政策不见得是好的(政策)”。^① 但是一些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则认为, 美国是民主政府, 公众应该对国家的政策拥有发言权, 理应成为政策的积极参与者。那么美国式的民主与外交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又是如何运作的? 由于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会反映出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某些共性, 因此研究公众舆论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将使我们对此相关的理论进行印证, 对民主式的外交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力量中, 公众舆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对此项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经过作者的检索和认真分析, 作者发现对公众舆论的重要研究, 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②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第一次对有关公众舆论各方面的问题, 如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形象和报刊等做出了全面和精辟的探讨和仔细的梳理。读者可以从李普曼的著述中体会到公众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的联系, 如舆论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形成的? 公众舆论的含义是什么? 谁是公众? 又是谁影响了公众的意见? 公众具有什么特点等? 总的来说, 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正确性和客观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公众具有不知情(uninformed)、不稳定(unstable)和易变(volatile)的特点,^③ 因而产生的舆论不值得信任, 不应该对政策产生影响。这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舆论观的认识。

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关系的研究主要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其中开创先河的学者当属托马斯·A·贝利(Thomas A. Bailey)和坎贝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① Hans U. Morganthau, *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9, pp. 150-151.

^②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 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 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 代表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撰有《政治导向》《放任与驾驭》《舆论学》《良好的社会》《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等30种著作。

^③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o the Almond-Lippmann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Dec, 1992), pp. 439-466.

托马斯·A·贝利在1948年出版了《街上的人们：美国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The Men in the Street: The Impact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贝利教授的研究关注国内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强调媒体、广播、国会辩论、利益集团的备忘录、民意测验等公众舆论因素对外交政策的作用。贝利教授对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各种舆论因素进行了分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了先河。他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美国人民建立的、最强大的公众舆论机构。华盛顿政府外交事务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我们公民的意愿，而我们的意愿之良莠将会影响整个星球的命运。”^① 教授对过去的外交政策也作出了评论，如评析了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愚民政策。但是分析的面虽然广，对各种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却没有展开深入探讨。不过一部好的作品尽管有一些瑕疵也绝不会使其有丝毫褪色之处。

阿尔蒙德在《美国人民与对外政策》（*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一书中阐述了美国社会三个主要变量：心理文化属性、社会结构和对外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了美国舆论对国际事务摇摆不定的态度，从理想主义到犬儒主义、从干涉主义到不干涉主义、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情绪”理论（*The Mood Theory*），认为美国公众舆论在诸如对外政策等公共政策问题方面没有固定的看法，有的只是“情绪”的“变化”（*Shifts*）和“波动”（*Fluctuations*）。^② 阿尔蒙德认为美国人普遍存在的对国际事务的冷漠，缘自美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国社会的结构，即美国人历来只关注在经济利益角逐中的个人抱负，着力于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关注美国社会与生俱来的权力以及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因而，对于复杂的、遥远的外交政策，只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做出不同的反应。普通民众的“摇摆情绪”对公共政策没有制约力，他们通常受到“关注问题的公众”（*attentive publics*）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年轻人、妇女、

^① Thomas A. Bailey, *The Man in the Street: The Impact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48, p.2.

^② Gabriel A.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60, p. 53.

收入高的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的和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和国际主义；而年长者、男人、收入低下人群、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对外政策中的犬儒主义、悲观主义、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①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与李普曼的观点一脉相承，后被霍尔斯特（Holsti）称为“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 consensus）。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认为公众舆论（1）易变（volatile），所以是影响外交政策制定中不可靠的参考因素；（2）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3）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小。^②

阿尔蒙德—李普曼的观点不乏支持者。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和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都认为公众舆论因其易变性而不应该过多地左右外交政策。菲利普·康沃思（Philip Converse）认为对某一具体事件的公众舆论“半衰期”^③短，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故而也不应对外交政策有所影响。^④贝纳德·科恩（Bernard C. Cohen）认为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很小，“我们（决策者）应该引导而不是遵从公众舆论”。^⑤利浦赛特（Lipset），拉费贝（LaFeber），利弗霖（Levering），帕特森（Paterson），格雷布纳（Graebner）^⑥都认为总统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该有更大的主动性，不应该受到公共舆论的左右。

① Gabriel A.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60, p.134.

②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o the Almond-Lippmann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Dec, 1992), pp. 439-466.

③ 半衰期本身的含义是指在发生放射性衰变时，放射性元素的核素减少到原有核素的一半所需的时间。公众舆论的半衰期表明在某一领域很有学问或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公众，如果不再补充新的内容，在一定时间后进入认知半衰期，即基础知识仍可用，其他的一半新知识已经落伍。

④ Philip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ited by Davia. E. Ap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⑤ Bernard C. Cohen, *The Public's Impact o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p. 63.

⑥ S. M. Lipset, *The President, the Polls, and Vietnam, Transaction* (September/October): 19-24. 1966; W. LaFeber, "American Policy-Maker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I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edited by Nagai and A. Iriy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R. B. Levering, *The Public and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18-1978*, New York: Morrow, 1978; T. G. Paterson, "Presidential Foreign Policy, Public Opinion, and Congress: Truman Years", *Diplomatic History* 3:1-48, 1979; N. A. Graerner,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A Pragmatic View." In *Interaction: Foreign Policy and Public Policy*, edited by D. C. Piper and R. J. Terchek.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詹姆斯·罗斯诺 (James Rosenau) 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罗斯诺致力于探讨有关外交政策舆论的传播方式 (behaviour), 他将公众分为普通公众 (mass public), 关注问题的公众 (attentive public) 和制造舆论的公众 (opinion-making public)。^① 而舆论制造者通常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群体, 他们可以将自己对一些事件的看法, 通过客观的交流平台传达给不知情的民众。而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其他外界的事务也并不知道。罗斯诺将舆论制造者分为 16 种, 将他们传播舆论的渠道分为 10 种 (3 种主要渠道和 7 种其他渠道)。^② 罗斯诺对于这种所谓的科学分类法的实证研究较为薄弱。所以许多研究公共政策制度, 尤其是研究舆论交流和舆论参与程度的学者认为这种分类并不实用。

多罗斯·A. 葛瑞伯 (Doris A. Graber) 的著作《公众舆论、总统和外交政策》(Public Opinion, President and Foreign Policy) 讨论的虽然不是本书聚焦的时间段, 但是她揭示了美国公众舆论、总统与外交政策关系的渊源, 因而对于研究美国舆论与外交政策关系的学生和学者都非常重要。本文进行了四个案例分析, 分别对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总统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外交事务进行了充分考察, 分析了总统及其顾问的外交决策过程, 提出了“当代决策理论”(modern decision-making theories),^③ 强调了总统外交决策中的主动性。她认为, 公众舆论只是影响外交政策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因素而已, 所有主要的政策走向应该由总统及其少数顾问来决定。过去如此, 现在也如此, 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自 18 世纪以来不曾有过实质性的改变。她得出结论: 美国公众希望总统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充分发挥其主动性, 并引导公众支持其政策。^④

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关系的研究在二战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不同观点俯拾皆是, 有关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方兴未艾。对于现

① James Rosenau, ed.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② Ibid.

③ Doris A. Graber, *Public Opinion, the President, and Foreign Policy: Four Case Studies from the Formative Yea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④ Ibid, p. 365

实主义的代表观点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的挑战频频出现。如威廉姆·卡斯普利撰文质疑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在对待国际事务时具有一种稳定的、强有力的“宽许情绪（permissive mood）”，而不像阿尔蒙德所说具有易变的特点。穆勒（Mueller）认为公众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逐渐趋于理性，尤其是对战争的反应。公众对政策的评价是基于调研和分析的结果，而非不稳定和波动的情绪所致。^①

约翰·密尔顿·库普（John Milton Cooper），查尔斯·C. 亚历山大（Charles C. Alexander），威廉姆·池迪克（William O. Chittick），简特森（Jentleson）（1992），宁契奇（Nincic）（1998）都讨论过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他们对公众舆论的稳定性和理性，以及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给予了肯定，他们认为公众舆论正在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 尽管公众对于外交事务缺乏一定的系统了解，但公众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也在逐步趋于一致，形成了持续、稳定的认识和反应。他们指出，关于公众舆论的疑难问题主要有，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事件上，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样的政治体系下公众舆论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那么公众舆论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阶段影响决策者？其影响机制又是什么？

现实主义者认为，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很小，这种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受到了质疑。如杨克洛维奇（Yankelovich）认为，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如今不再是“总统知道一切的时候了”（*Farewell to “the President knows best”*），^③ 公众知道的或许远比总统多。谁引导，谁遵从（Who leads, who follows）的模

① J. E. Mueller,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Wiley, 1973.

② Charles C. Alexander,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930-1945*,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9; John Milton Cooper, *The Vanity of Power American Isolationism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7*,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69; William O. Chittick, *State Department, Press and Pressure Groups a Role Analysis*,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B. W. Jentleson, “The Pretty Prudent Public: Post-Post Vietnam American Opinion on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6:49-73. 1988; M. Nincic,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olitics of Opposites”, *World Politics* 40:452-475, 1988.

③ D. Yankelovich, *Farewell to “President Knows Best”*, *Foreign Affairs* 57:670-693, 1979.

式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互动影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争论随之也越来越多。

莱斯特·马克尔 (Lester Markel) 也对现实主义舆论观提出了挑战，他于1949年出版了其主编的《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本书主要探讨与分析了美国国内外的媒体和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马克尔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民意测验、报纸专栏作家有关外交政策的论述、记者招待会的资料以及“美国之音”VOA (Voice of America Broadcasts) 的报道，充分阐释了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指出了公众舆论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对阿尔蒙德—李普曼观点的挑战。

B.I.佩奇 (B.I. Page) 和 R.Y.夏皮罗 (R.Y.Shapiro) 对公众舆论的易变性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作者通过对大量数据和过去五十多年民意测验的分析，发现随着民主深度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公众的好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正在逐渐加深。6000多个问题中至少有20%重复过，这就为两位作者评价公众态度的稳定性提供了数据支持。研究表明，综合看来公众舆论是稳定的、理性的。公众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如果发生变化，也并非随意的和混乱的变化，而是“理性的、事件驱动的”(rational, event-driven) 反应。^① 他们得出结论“公众舆论的快速变化与政治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或是与敏感的公众所关注的重大事件有关。特别是外交政策的突变通常发生在战争或危机期间，美国和其他国家国民的反应对于政策的优先选择影响极其深远。”^②

尤金·维特科普夫 (Eugene R. Wittkopf) 在1990年出版了其著作《国际主义的方方面面：公众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对公众舆论的不稳定性和随意性提出质疑，认为“美国公众可能不甚知情，但他们仍然可以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形成连贯、稳定的看法”，

^① B. I. Page and R. Y. Shapiro, "Changes in Americans' Policy Preferences, 1935-1979",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6: 24-42. 1982.

^② B. I. Page and R. Y. Shapiro, "Changes in Americans' Policy Preferences, 1935-1979",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6: 24-42. 1982.

“他们的态度以及更深层次的信念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① 同时他对普通大众舆论与精英舆论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将普通大众和精英分为四类：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s 支持好战的和合作的国际主义观点），孤立主义（isolationists 二者都反对），强硬派（hardliners 支持好战的国际主义，反对合作的），迁就主义者（accommodationists 支持合作的，反对好战的国际主义）。自由派大多是迁就主义者；温和派和保守派在其他三种中都可见到，但绝不是迁就主义者。党派与外交政策的态度也相关，如共和党通常是强硬派。而公众也有不同倾向，热心公众和精英通常是国际主义的中心人物。企业精英们却通常反对合作的国际主义，而往往成为孤立主义者。这样的分类对于研究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影响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因素，以及公众舆论形成的原因等方面都有所帮助。这本著作十年成书，信息量之大，覆盖面之广，都属少有。他的研究为一些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答案，如美国普通大众和精英大众如何看待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他们是如何评判危机和机遇的？他们更喜欢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外交事务是如何影响他们对总统的评价等？

理查德·索伯（Richard Sobel）并没有对现实主义舆论观提出质疑，但他认为尽管公众舆论不能强制规定美国的政策取向，却为政策制定者限制了选择的范围。^② 作者分析了公众舆论是如何影响宪法批准的三位最高政策决策人的（the top three constitutional policymakers）：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他从政策制定者的宣言、回忆录、访谈等中分析了决策者与美国公众和民意测验之间互动的程度和内容。由此判断决策人对公众舆论的敏感度，以及他们受民意限制的程度。尽管这种方法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但是他的案例分析的确揭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制约力。

贝纳德·科恩（Bernard C. Cohen）的著作《新闻舆论与外交政策》

^① Eugene R. Wittkopf. *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4, 221.

^② Richard Sobel,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Constraining the Coloss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